

清朝通史

蔡美彪等
著

第二冊



人
文
大
系
列

目 录

第三章 乾嘉时期的清朝	1
第一节 乾隆帝统治的确立	1
一、乾隆初政诸措施	2
二、边疆战事的发动	7
三、帝后巡游与究治朋党	11
第二节 边疆战事的发展与思想统治的加强	18
一、西北和西南的战事	19
二、侵缅战争的失败	25
三、巡游的继续与皇家园囿的修建	27
四、满洲贵族与八旗兵丁	34
五、思想统治的加强	41
六、人民的反抗斗争	52
第三节 对外战争的继续与吏治的腐败	57
一、对邻国的战争与英国使团的来使	57
二、西藏制度的改订	62
三、吏治的腐败与人民的反抗	65
四、乾隆帝退位	84
第四节 农民起义与英国在海上的侵扰	86
一、川陕楚地区的农民起义	87
二、英国在海疆的侵扰与鸦片的输入	99
三、浙闽粤沿海人民的斗争与豫鲁直三省的农民起义	102

四、嘉庆帝病死	109
第五节 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	110
一、蒙古族	110
二、东北诸族	120
三、维吾尔族与西北诸族	122
四、回族及撒拉等族	126
五、藏族	127
六、彝族与云南诸族	130
七、苗、瑶、僮族及南方诸族	137
第四章 封建经济的衰落	145
第一节 农业与农民	145
一、农业生产	146
二、地权分配	155
三、租佃关系	163
四、农业雇佣	170
第二节 赋税与财政	178
一、清王朝的“轻徭薄赋”政策	178
二、清王朝的财政加派	183
三、清王朝的财政政策对各阶级的影响	192
第三节 工商业	200
一、工商业概况	200
二、清王朝与工商业	213
三、行会与工商业	219
四、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224
第四节 对外贸易	230
一、清王朝的禁海闭关政策	231
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	237
三、中国与友邻国家的贸易和经济联系	251

第五章 文化概况 ······	262
第一节 理学、哲学与经学 ······	262
一、明清之际思想家的争鸣 ······	263
二、程朱理学的再提倡 ······	268
三、汉学的昌盛 ······	272
四、今文经学的复苏 ······	278
第二节 学术著述 ······	280
一、类书与丛书 ······	280
二、历史学著作 ······	282
三、地理著述与方志 ······	289
四、金石学 ······	292
五、语言文字学 ······	293
六、目录学 ······	296
第三节 文学艺术 ······	297
一、小说 ······	298
二、诗文 ······	300
三、戏曲 ······	303
四、绘画与书法 ······	305
第四节 天文学、数学与地理测绘 ······	307
一、天文学 ······	308
二、数学 ······	308
三、地理测绘 ······	310
清代纪年表(太祖至仁宗) ······	311
地名表 ······	312
人名索引 ······	321

第三章 乾嘉时期的清朝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八月,清雍正帝(世宗)在北京病死,遗诏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次年,改年号为乾隆(一七三六年)。

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到乾隆帝即位时,已形成为国力富盛的大国。(一)康熙帝战胜了汉族军阀的所谓“三藩之乱”后,不再有大规模的反清战争。康熙、雍正两朝逐步建成适合于汉地封建社会特点的统治制度,确立了对广大汉族人民的统治。雍正时期,汉族民众的反清和反满斗争虽然仍在继续,但总的说来,清王朝在汉地建立的封建统治秩序已经逐渐巩固。(二)康、雍两朝也逐步建立了对边疆各民族地区的统治。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归附于清朝。天山南北路在准噶尔部噶尔丹败死后,也已归入清朝的统治范围。西南地区,加强了对西藏和云南各民族的统治。东南沿海,台湾郑氏降附后,归于福建省统辖,海疆的统治也渐趋稳固。乾隆帝即位时,虽然准噶尔部仍然对清朝的统治有所抵抗,但整个说来,清王朝已经基本上奠定了它的统治领域。(三)清王朝经康、雍两朝建立起统治秩序后,经过长期战乱而衰敝的社会经济又得到恢复和发展。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清王朝的赋税收入不断增长,逐渐成为财力充裕的富国。

与清初几代创业之君即位时的情形不同,乾隆帝承袭了乃父乃祖的遗业,在统治巩固、国力富盛的局面下开始了他的长期统治。

第一节 乾隆帝统治的确立

乾隆帝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康熙五十年八月生。母钮祜禄氏,雍正帝

封熹贵妃。弘历六岁时,由康熙帝收养宫中,亲授书课,深得宠爱。雍正帝即位后,为防止日后的皇位纠纷,秘密书写继承者的名字,封存于乾清宫匾额之上。密书名即是弘历。雍正帝在位时,弘历深居读书,尤好汉诗文,虽曾参与军事谘议,受封为和硕宝亲王,但基本上是生长深宫,如他自己所说:“于外事总未经历”(《高宗实录》卷一),与乃父即位前迥然不同。

乾隆帝即位时,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张廷玉、原任大学士鄂尔泰等开读密封,拥帝即位,受命辅政。乾隆帝服丧期间,由允禄等总理事务王大臣执政,撤销雍正时设立的军机处,另设总理事务处办事。在此期间,乾隆帝仍不时过问政事。乾隆二年十一月,乾隆帝服丧期满,亲自执政,总理事务王大臣解任,总理事务处也随之撤销。复设军机处,草拟诏旨,处理章奏,以鄂尔泰、张廷玉等为军机大臣。乾隆帝由此组成满汉大臣集团,建立起他的统治。

一、乾隆初政诸措施

乾隆帝依“密封建储”制,顺利地继承了帝位,避免了皇位争夺和朋党纠纷,但也正由于此,他在即位前并未能建立起足够的威望,在他的周围也未能聚集一批可以信赖的臣佐。他在清王朝已臻富盛时即位,原只能做个守成的君主,但他又并不甘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为,以树立自己的声威,巩固皇室的统治。雍正帝因力矫康熙末年的积弊,施政不免严猛。乾隆帝在即位的次年乾隆元年二月的诏谕中说:“大抵皇祖圣祖仁皇帝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峻之弊。朕缵承统绪,继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几惇大成裕之治。”(《高宗实录》卷十二)乾隆帝这段话表明:他力图矫正前朝或宽或严之弊,从而以所谓“宽严相济”作为施政的方针。乾隆帝即位之初的十多年间,依此方针,实行如下的一些重大措施。

(一) 宽赦与严惩

乾隆帝初即位,即下诏说:“凡皇考办理未竟之事,皆朕今日所当敬谨继承者。”(《高宗实录》卷一)但依据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对前朝已经处置的重

大案件，又重新做了处理。

雍正帝严惩宗室兄弟，翦除政敌允禩、允禟一党，令其削籍离宗，赐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继死于狱中。宗室多人也被株连。乾隆帝即位后，雍正十三年九月，诏宗人府依圣祖康熙帝处置宗室例，将宗室、觉罗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孙除去玉牒，不准载入者逐一查明，分赐红带、紫带，附载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禩、允禟宽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谱牒。又命廷臣重议允禩、允禟子孙事。十一月，诏依圣祖处置莽古尔泰等例，将允禩、允禟之子孙，给予红带，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认他们的宗籍，仍为皇族。乾隆帝此举，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显的。雍正帝处置年羹尧案，涉及依附他的汉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属子孙均被流放。乾隆元年三月，下谕说，“汪景祺狂乱悖逆……其兄弟族属南北远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载有余，著将伊兄弟及兄弟之子……开恩赦回。”（同上，卷十四）族人牵连革禁者，也予宽宥。查嗣庭子侄拘系配所者，也从宽赦回。

乾隆帝在宽赦前朝满汉罪臣族属的同时，又严厉处置了曾静、张熙。湖南靖州人曾静及弟子张熙，因雍正时传播吕留良反满思想，劝说岳钟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讲，自陈悔悟。乾隆帝即位后，随即加重处置，说：“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同上，卷九）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乾隆帝初即位，即处置曾、张，旨在镇压汉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显的。

（二）减免赋税

清王朝建立起封建制的统治后，征收赋税是对广大农民的主要的剥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钱粮的主要手段。因而减免赋税便成为朝廷争取各阶级民众的最便当的方法。乾隆帝即位时，前朝建树的富盛的国力，为他准备了减免赋税的物质条件。父祖因减免赋税而博得赞誉的事实，又为他提供了借鉴。乾隆帝初即位下诏颁布合行事宜，恩赏各级官员，即令查明“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候旨豁免。”（《高宗实录》卷二）甘肃省因连年负担军需，雍正帝在世时已有旨，将本年地丁钱粮全行捐免。此后十年间，乾隆帝不断减免各地赋税。全省通免及一次减十州县以上者，屡见于清《高宗实录》及乾隆《会典》。乾隆元年二月，在豁免甘肃应征钱粮的同时，又谕“陕西只征一半，

以昭格外之恩。”(同上,卷十二)又免贵州通省钱粮一年。二年,免顺天直隶额赋,免山东正项钱粮一百万两。三年,免江南松江府额赋。四年,免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逋(欠)赋。六年,免福建台湾逋赋,江苏苏州等府属逋赋。七年,免直隶、江苏、安徽、福建、甘肃、广东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赋,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项。十年六月,又命普免全国次年钱粮,下诏说:“朕临御天下……躬行节俭,薄赋轻徭……是以左藏尚有余积。数年以来,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赈济,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抚绥安插,计费帑金千余万两。”“朕思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将丙寅年(乾隆十一年)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豁免。”(同上,卷二四二)廷议三年之内轮免一周。乾隆十年下诏普免钱粮,一时颂为盛事,也说明当时确是财力充裕,左藏有余。乾隆帝即位后的十多年间,如他自己所说,各地遇有水旱雹灾地震等害,也都加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各地的多项杂税,史不绝书。乾隆帝以减少税收的办法,安定人心,防止动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汉人文士的选用

清王朝经过康、雍两朝采用汉制统治广大汉人地区,汉人文臣已在统治集团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后,在处置曾、张以镇压汉人反抗思想的同时,又以多种方式,选擢文士,开拓仕途,以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康熙时曾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擢选文士。雍正十一年,曾诏举博学鸿词。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帝即位后,随即于十一月下诏说:“皇考乐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鸿词之士,以备制馆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因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高宗实录》卷六)次年二月,各省所举文士即有一百余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御试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阅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亲自召见,授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为翰林院编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陈兆仑、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授为翰林院检讨,未经中举的杨度汪、沈廷芳、汪士鋐、陈士璠、齐召南授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二年七月,张廷玉等又考取续到博学鸿词之士一等万松龄、张汉为翰林院检讨,二等朱荃、洪世泽为翰林院庶吉士。博学鸿词科是皇帝特设的制科,考取者即可入

官翰林院，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贵于例行的科举。

乾隆二年五月，举行定例的科举，考取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赐进士及第三人，进士出身八十人，同进士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殿试进士，原由主考官阅卷。乾隆帝亲自阅定前十名，诏谕主考官说：“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语字画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七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乾隆帝亲自阅卷，决定名次，掌握了科举取士的权柄。同年，又亲自考试翰林、詹事等官，说：“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高宗实录》卷四十）阅卷后，依文字优劣，定为四等，分别予以升降，以至休致。乾隆帝由此加强了对文士的选擢和控制。康熙以来，国子监生和知县官缺，可输钱米捐纳，是一项弊政。乾隆帝即位后宣布停止捐纳，也有利于科举取士制的实行。

乾隆元年六月，乾隆帝命内阁学士方苞主持选颁四书文，将明朝及清初的科举应试文章，选集数百篇颁布，以为举业指南。六年正月，又谕各省督抚学政，采访近世研究经学的著述，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十四年十一月，因翰林以文学侍从，多致力于词章，诏谕各省公举潜心经学之士，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以应精选。由此访得顾栋高等名儒四人，于十六年并授国子监司业。乾隆帝通过多种途径察访文士儒生，也从而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

（四）统治核心的整顿

乾隆帝初即位，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与鄂尔泰、张廷玉受命辅政，组成最高的统治核心。乾隆帝亲政后的十多年间，对这个核心势力，逐步整顿，使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

允禄、允礼是雍正帝的兄弟，也是宗室中最有威望的亲王。乾隆元年三月，乾隆帝因祭堂子（祭天）时，允礼托病不到，削去亲王双俸和护卫。乾隆三年，允礼病死，允禄受命总理事务并任理藩院尚书。乾隆帝察知他与允禩子弘晳、允祺子弘昇、允祥子弘昌等来往，指为“私相交结，往来诡密”，于乾隆四年十月交宗人府审处。弘晳革去亲王，弘昇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允禄从宽免革亲王，仍管内务府事，革退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职及亲王双俸。十二月，弘晳又被告发听信巫术，向妖人询问国事，指为“大逆不道”，永远禁锢。

允禄也被罚俸五年，“以示惩儆”（《高宗实录》卷一〇六）。辅政两亲王先后失去权势，宗室子孙不敢“私相结纳”了。

乾隆帝即位亲政，复设军机处后，鄂尔泰与张廷玉分任满、汉军机大臣，总理朝廷大政。鄂尔泰历仕三朝，能文能武，雍正十三年七月，因办理贵州苗疆事务获罪，解大学士任，削去一等伯爵。乾隆帝即位，受命为总理事务大臣，授一等子爵。次年，为军机大臣，三等伯。乾隆三年兼议政大臣。安徽桐城人张廷玉，康熙时曾以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雍正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会典总裁，晋为大学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辅政为总理事务大臣。元年，复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二年，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汉人文臣爵至侯伯，为前此所未有。张廷玉以进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连膺重任，并一再充会试考官，成为汉人文臣和文坛的领袖。

乾隆帝即位，倚用鄂、张二老臣辅政，并将雍正帝生前的谕旨入于遗诏，说：“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朕万年之后，二臣著配享太庙。”朝臣配享太庙，前此如费英东、额亦都等，都是满洲元勋。汉人文臣配享，是历来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只有张廷玉一人。鄂尔泰、张廷玉主持军机处后，权势尤盛。乾隆帝为防范满、汉朝臣结党，屡次申谕饬戒。乾隆五年四月，在一个谕旨中说：“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令节，永受国恩。”“二臣当更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同上，卷一一四）昭梿《啸亭杂录》说：“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帝（雍正帝）朋党论戒之。”乾隆帝亲自处理朝政，大权独揽，又多次告诫臣工，预防朋党。

鄂尔泰是著名武将，又主持文坛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主考会试，门下满、汉臣僚甚众。受命辅政，位至尊显。子鄂容安也在乾隆元年，授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后转侍读，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门在朝中权势甚盛。左都御史仲永擅乾隆元年进士，是鄂尔泰主考的门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发与鄂容安结党营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昭梿《啸亭杂录》以此事为刑部侍郎张照诬谮）。乾隆帝说他“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不睦之人，情罪甚属重大。”（《清史列传》）审理此案的王大臣请将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帝特予宽容，“交部议处，以示薄罚”，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职。

仲永檀死于狱中。乾隆十年正月，鄂尔泰因病请解任，有旨慰留。四月病死。

自鄂尔泰获罪后，张廷玉主持军机处，权势益重。早在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即上奏说：“外间舆论，动曰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张若澄入直南书房，以便扶掖入朝。十三年，张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准。十四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悦，乃许致仕。次日，张廷玉未入朝，只命若澄入谢。乾隆帝大怒，命发旨诘责。张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谢恩。乾隆帝又怀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职，削去张廷玉伯爵，命以大学士衔休致留京。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疏请南还，乾隆帝更怒，严加斥责。张廷玉疏请治罪。乾隆二十年四月病死，年八十。仍命配享太庙。

张廷玉在乾隆朝，执政十余年。作为汉人文臣的领袖和代表，权位至于极盛。乾隆帝倚用汉人文臣而又时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满汉均为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视。乾隆帝即位后约二十年间，满汉大臣之间并未出现严重的朋党纷争。

二、边疆战事的发动

乾隆帝即位的二十年间，主要在稳定政局，巩固他的统治，并未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初年曾出兵镇压贵州苗族的反抗，乾隆十一年又开始了对四川西部大小金川的征剿。

(一) 苗疆战事

雍正帝时，张广泗等攻占贵州古州苗人地区，鄂尔泰在古州设镇，为总兵驻地。又在苗岭山脉及清水江、都江流域的清江（清水江）、丹江、八寨等城设立协营驻兵。后改清江为镇，与古州分辖。鄂尔泰因而晋封伯爵，入为武英殿大学士。雍正十年，清军在台拱驻兵，引起苗民反抗。次年，清军攻占台拱。雍正十三年春，各地苗人因反抗征粮起义，接连攻陷数城。六月，雍正帝诏发云南、四川、湖北、广东等六省兵会剿，特授云南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领兵作战。七月，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总

领其事。张照至苗疆，认为强行“改土归流”并非良策，与哈元生不和。清兵数月无功，苗人起义更加迅速发展。鄂尔泰也因此被免去大学士职。

乾隆帝即位后，十月间逮捕张照，治罪，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诸军。张广泗至军，劾哈元生徒事招抚。免官逮入京师论斩。乾隆帝命免死赴西路军效力。张广泗又劾董芳师集数月，剿抚无端。免官逮至京师，以副将发云南。张广泗调集贵州兵，集中于镇远府。分三路进攻苗寨。乾隆元年春，又增加兵力，分八路进军。四五月间，对起义苗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六月间战事结束，共毁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斩杀一万七千余人，俘虏二万五千余。乾隆帝不惜发动大军大肆屠杀，为苗民带来惨重的灾祸。但迫于苗民的坚决反抗，战事过后，仍不得不宣诏免除苗疆的钱粮，永不征收。苗人之间的诉讼，也仍依苗人习俗处理，不拘清朝的律例。

(二) 对瞻对土司的镇压

四川打箭炉西北，有瞻对土司，居雅砻江畔岸山中，称为上瞻对、下瞻对。各有首领（土目），居民是土著的藏族。有人恃险劫货，掠及清台站士兵。官府捕治时，土司隐匿不交。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复偕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奏请发兵进剿。庆复、李质粹分兵数路围剿上瞻对，上瞻对土目四郎降。清兵合力进攻下瞻对诸寨，下瞻对首领班滚力战，不敌，请降。庆复不许，上疏报捷。乾隆帝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乾隆十一年春，庆复以明正土司汪结为导向，继续进军。四月，庆复、李质粹领兵进攻丫鲁地方，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内所居男女老幼，俱被火烧。李质粹咨报班滚已自焚死。六月，庆复据以奏报朝廷。乾隆帝以为可疑，说：“惟班滚渠魁，断不可容其漏网。”传谕庆复继续查访，“留心踪迹，毋留遗孽。”（《高宗实录》卷二六八）清军暂且收兵。

(三) 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

四川西部金沙江上游，有两水，因山中产金，俗称为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两川附近地区，称大金川为促浸水，小金川为儵纳水。大金川首领嘉勒塔尔巴于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由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师印，统领部众。其庶孙莎罗奔曾随岳钟琪部进军西藏，有功于清廷。雍正元年授予金川安抚使的封号。莎罗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据一方，声势渐盛。又以己女阿扣嫁小金川

首领泽旺，以图控制。乾隆十年，莎罗奔曾将泽旺捉拿，被清大学士管川陕总督事庆复制止。庆复在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奏报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细（即莎罗奔）性更凶顽……更欺压小金川。去年竟有将小金川土司拿去之信。经臣差弁严查……方遣土目具稟军前，当即严加申饬。”（《高宗实录》卷二八三）乾隆十二年正月，四川巡抚纪山奏报说，莎罗奔侵占邻近的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彼此仇杀，并诱夺泽旺印信。乾隆帝认为是土司之间的“小小攻杀”，诏谕“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令其畏惮奉法，恩抚感怀，各得其道，先事所筹，无致轻有举动。”（同上，卷二八四）随后，庆复又奏报莎罗奔“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土司所属之鲁察景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乾隆帝得报大怒，说：“看此情形，则贼首恃其巢穴险阻，侵蚀诸番，张大其势，并敌扰我汛地，猖獗太甚。”三月，调任镇压苗民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会同庆复相机进剿（同上，卷二八六）。

张广泗领兵三万进攻金川。六月，小金川土司泽旺及弟良尔吉来降。张广泗即驻兵于泽旺的美诺寨，命良尔吉从征。庆复被召回京。张广泗分兵两路攻打大金川。莎罗奔阻山为石垒，清军无法前进。十月，纪山及张广泗先后奏报莎罗奔乞降。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此番官兵云集……，断无以纳款受降，草草了局之理。著传谕张广泗，务将莎罗奔擒获。”（同上，卷三〇一）十一月，张广泗又奏报莎罗奔遣使乞降，“臣复面加晓谕……，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乾隆帝旨复：“甚是！甚是！是慰朕怀。”又批：“好！明告之，甚是。”（同上，卷三〇五）年底，清军仍不能前进。

在此期间，张广泗察知下瞻对首领班滚隐藏未死，庆复奏报班滚自焚事不实。乾隆帝命他继续查访核实，将庆复免官，与李质粹同下刑部狱。审讯，以贻误军机论斩。乾隆十三年正月，张广泗又奏请增兵一万进攻，但至三月，仍无进展。四月，乾隆帝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讷亲为经略大臣，到四川督师，并起用削职的岳钟琪以总兵衔到军中听用，起用董芳为四川重庆总兵从征。大金川以勒乌围与噶尔崖两寨为主要据点。莎罗奔自驻勒乌围，其侄郎卡驻噶尔崖。六月间，讷亲至军，急于求功，限令三日攻下噶尔崖。清军发起猛攻，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无功而退。张广泗蔑视讷亲，临阵推诿困扰。讷、张不和，军心瓦解。讷亲上疏劾奏张广泗“糜饷老师”。岳钟琪至军，升为四川

提督。雍正时，岳钟琪遭张广泗弹劾罢官。这时，他也密奏张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泄露军机。九月，乾隆帝将张广泗革职，交刑部治罪。十二月逮捕入京处死。讷亲也被召回京，以贻误军机革职治罪。次年正月，被处死。

乾隆帝召回讷亲、张广泗后，九月间，晋升协办大学士傅恒（满洲镶黄旗人）为保和殿大学士，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十月，傅恒奉旨出发，十二月入川。傅恒至军，在卡撒驻营。察知张广泗信用的良尔吉，与莎罗奔女阿扣私通，向莎罗奔密报军情。随即将良尔吉、阿扣及引荐良尔吉的汉人王秋斩首，军中震动。傅恒奏报作战方略、当地险要形势及期以四月间取胜，并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乾隆帝得报“深不以为然。”这时，边疆战事已经并非必要地拖延经年，损兵折将，虚耗资财。乾隆帝已渐有悔悟，谕军机大臣传谕傅恒，说他“辗转思之，竟至夜不成寐。”“现在酌拨帑项千万有奇，至动及各省留备银两，已属拮据。”“乘此机会，因而抚纳，亦足以振军威而全国体。”（同上，卷三三一）几天后，又以“恭奉皇太后懿旨”名义，传谕傅恒，限令四月初旬以前结束战事。次年正月，乾隆帝决意撤兵，诏谕说：“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另有谕旨寄发，召经略大学士傅恒还朝。”（同上，卷三三二）傅恒接谕后，交还原旨，请求继续攻打噶尔崖，说：“攻克贼巢，旦夕可必。一篑之亏，诚为可惜。”（《清史列传·傅恒传》）乾隆帝得报，不允。再次下谕，召傅恒还朝，并赐诗三章，有句云：“武岂黩兵应戒彼，绩惟和众孰同斯；功成万骨枯何益，壮志无须效贰师。”（同上）傅恒得旨，适莎罗奔遣使来降。傅恒谕令莎罗奔、郎卡亲到清营来降，当赦免不杀。为取信于莎罗奔，提督岳钟琪只率十三骑亲自到勒乌围开谕。莎罗奔率领郎卡随岳钟琪到清军大营投降，誓遵六事：不侵犯邻封、归土司侵地、献出凶手、资送内地人、纳军械、供徭役。傅恒宣诏赦免莎罗奔，领兵还朝。乾隆帝褒赏傅恒，后封岳钟琪三等公，赐号威信。董芳赴镇料理善后，以功加左都督。

乾隆帝先后发动对瞻对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战事经年，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祸，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的发动，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只是因为边地出现的某些纠纷。这些纠纷本来并不是不可以妥善处理。乾隆帝轻率出动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当地土司首领的投降，务期“尽灭”以维护所谓的军威国体，实际上也就是树立乾隆帝的声威。乾隆帝横暴的镇压，

遭到边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先后处死大学士、总督等满汉重臣三人，将官多员战死，伤亡兵士数千。战争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实销六百五十八万，移驳一百十七万。见赵翼《檐曝杂记》卷二），以致不得不动用各地的后备，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然不得不收兵纳降，继续承认当地土司的统治。军事上的表面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失败。不必要的连年战争冲击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为此后的黩武邀功开了端绪。

三、帝后巡游与究治朋党

乾隆十年，乾隆帝在捐免直省赋税的诏谕中曾自称：“朕临御天下，十年于兹，抚育蒸黎，民依切念。躬行节俭，薄赋轻徭。”“今寰宇敉宁，既鲜靡费之端，亦无兵役之耗。”（《高宗实录》卷二四二）如果说，大小金川之役是开始了并非不可避免的“兵役之耗”，那么帝后的巡游和皇室的豪侈，又开了“靡费之端”。

（一）帝后巡游

康熙二十四年在承德府修建行宫，称避暑山庄。夏秋间皇帝在木兰狩猎，称为“秋狝”。驻跸避暑山庄听政。秋狝驻跸实际上是继承了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纳钵制的传统，以保持骑射的武风。但山庄的修建，模仿江南园林，日益豪侈。乾隆帝于乾隆六年开始举行秋狝，奉母钮祜禄氏皇太后（嘉庆时谥孝圣宪皇后）同行，驻山庄避暑。此后隔年一至。乾隆十六年以后，每年夏秋必至，均奉皇太后同行。乾隆帝上效康熙帝，又连年巡游南北各省，号为东巡、西巡和南巡。康熙帝的出巡，旨在考察形势、巩固统治和视察黄河的治理。乾隆帝的巡游，主要以游乐为目的，上下虚耗，所经之处竞尚侈丽，带来巨大的靡费。

谒陵与东巡 乾隆帝生长京师，不知满洲故乡风土。乾隆八年八月，奉皇太后自北京启行，前往盛京祭谒祖陵。临行前下谕说：“朕奉皇太后前往盛京，恭谒祖陵，所有经过州县，不令丝毫扰累。但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将各地本年应征钱粮捐免。所谓“不令丝毫扰累”，自是空文。“有资民力”，

则是事实。启行之前,各地即忙于修筑桥梁道路,铺设驻跸宫幄等所谓“应办差使”。孝圣太后与乾隆帝途中驻跸避暑山庄,在木兰行围。蒙古王公台吉随行。行围后赐宴并颁赏腰刀缎疋,随行兵士亦各有赏银。行经召乌达盟,盟长贡献牛羊驼马。乾隆帝以经过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桥道,备办一切用项,俱属整齐妥协”,下谕褒奖,对各级官员、兵丁颁赏大批缎布等物。九月,至盛京,先赏赐盛京将军银五千两、副都统银二千五百两。随即举行大宴,盛京文武官员、三陵官员及自京随来的王公大臣、官员、蒙古王公、额驸等均入宴,规模盛大。皇太后与乾隆帝先祭谒永陵(景祖觉昌安、显祖塔克世陵。原称兴京陵,顺治十六年尊称永陵),然后祭福陵(太祖陵)及昭陵(太宗陵)。三陵祭仪,均依康熙时定例。祭后又盛宴诸王及文武大臣,庆贺礼成。乾隆帝受贺并亲制《盛京延宴世德舞辞》,以汉高帝过沛而歌大风自比。随即以礼成颁诏全国,赏赐文武大臣及奉天旗民。乾隆帝此次东巡谒陵,朝廷耗费了大批的赏赐,盛京及所经各地为接送帝后,更耗费了无数的人力与财力。

乾隆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后谒陵。八月,途经吉林,驻跸,渡松花江,游龙潭。因“途次迎銮者,踊跃趋事”,奖谕吉林将军、副都统以下各级执事官员、兵丁,赏给缎疋、银两。抵盛京谒陵礼成,又依例颁赏盛京官兵,较乾隆八年更为丰厚。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因备办祭典“并不竭尽诚敬,草草办理”,被革职发往黑龙江。乾隆帝赏罚分明,更加助长了地方官员迎銮的靡侈。

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去曲阜谒孔子陵庙,游泰山,是为东巡。沿途迎銮竟尚侈丽,过于盛京谒陵。乾隆帝在乾隆十六年的一个诏书中说:“自十三年东巡,该抚等于省会城市,稍从观美,后乃踵事增华。虽谓巷舞衢歌,舆情共乐,而以旬日经营,仅供逐次一覽,实觉过于劳费。且耳目之娱,徒增喧聒,朕心深所不取”。事过之后,乾隆帝以“深所不取”为言,以求限止。当年的奢费,不难想见。

西巡五台 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又奉皇太后往易州谒祭泰陵,然后西游五台山,号为西巡。自顺治帝定都北京后,顺治、康熙两帝都葬在遵化。雍正帝生前,即把自己的葬地定在易州泰宁山下,并修建了陵园。乾隆二年,葬雍正帝于此,称为泰陵。乾隆十一年九月,乾隆帝与皇太后到泰陵行祭礼,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随行。谒泰陵后,自易州去山西五台游赏。乾隆帝下谕说,他